

道统思想与 中国哲学

DAOTONG SIXIANG YU
ZHONGGUO ZHEXUE

蔡方鹿

主编

道统之说最早滥觞于孟子，其言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



人民教育出版社

道统思想与 中国哲学

DAOTONG SIXIANG YU
ZHONGGUO ZHEXUE

蔡方鹿

主编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方国根

责任编辑:崔秀军 武丛伟

封面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蔡方鹿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01-017650-5

I. ①道… II. ①蔡… III. ①道统-文集②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177 号

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

DAOTONG SIXIANG YU ZHONGGUO ZHEXUE

蔡方鹿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2.75

字数:890 千字

ISBN 978-7-01-017650-5 定价:1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哲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前言

陈 来

由中华朱子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四川师范大学开幕，我谨代表中华朱子研究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承办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子有密切的关系。朱子的《中庸章句序》集中地论述了他关于道统和道学的观点。在朱子看来，什么是“道统之传”？“道统之传”就是指道统的传承。如果说“道统”和“道学”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说道统是“道”的传承谱系，道学是“道”的传承内容。照朱子在这篇序文所说，道统之传始自尧舜，这是根据《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段话而来的。《论语》的这段是追述尧禅让于舜的时候对舜所说的话。照《论语》这一段最后一句的说法，舜后来禅让于禹的时候，也对禹重复了这些话，但没有具体记述舜所说的话。《古文尚书·大禹谟》篇里面记述了舜将要禅让于禹时所说的话：“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此，朱子认为尧、舜、禹三代是以“允执其中”的传承而形成道统的。以后，“圣圣相传”，历经汤、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传至孔子；孔子“继往圣”，即继承了尧舜至周召圣圣相承的道统。孔子以后，则有颜子、曾子，再传至子思（子思即是《中庸》的作者），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亦能“承先圣之统”，也就是承继了这一古圣相传的道统。这就是朱子承认的道统早期传承的系谱。而道统相传的内容就是以“允执其中”为价值核心的思想，这就是道学。朱子认为《中庸》正是子思对这一道学思想的发挥和展开。

关于儒学道统的谱系，由唐至宋，已有不少类似的说法，但朱子首次使

用了“道统”的概念，而且朱子的重要发明是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道学的内容。实际上是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和“允执厥中”结合在一起作为古圣相传的道学的内容。所以，《中庸章句序》的重心是对道心、人心说的阐明。在这种诠释之下，道统的重点“中”就被转移为道心、人心之辨，突出了道统的道德实践意义。朱子对道统和道学的阐释在宋以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统的观念史证明，不同的时代对道统有不同的诠释，以适应当时的社会文化传承的需要。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所理解的道统，就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这也是道统讨论的现代意义。

最后，让我再一次对承办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张栻思想与蜀学研究中心，让中华朱子研究会有机会参与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感谢。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作者单位：中华朱子研究会）

目 录

前 言	陈 来 1
朱子论“道统”与“道心”	[美] 成中英 1
——从道的文化体现至道的道德实践	
道统思想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及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	蔡方鹿 15
儒家学统的重建	景海峰 36
论儒家道统思想及其历史演进	刘原池 47
儒家“道统说”的演变及其二重性	李振纲 65
儒家道统说的产生和发展	郭 齐 尹 波 78
道统与文化遗产	[德] 施维礼 (Wolfgang Schwabe) 83
儒学传道的诸种方式及其意蕴	李承贵 90
儒家师道的兴替	金生杨 98
儒学道统与家庭教育	张利明 110
伏羲、神农、黄帝纳入儒家道统谱系的由来、变迁及其原因	张培高 119
回到“轴心时代”	张 丹 135
——“道统”问题重探	

颜子之儒“学圣”、“言道”特质在传世文献与上博简中的体现	冯和一	149
孟子道统建构发微	马兰兰	173
道统意识与庄子的儒家解读	陈 静	182
——简论朱文熊《庄子新义》的道统观		
荀子对《尚书》“习与性成”说的发展	李记芬	197
——兼论荀子与儒家道统		
《中庸》与程朱道统论之建构	潘 斌	213
“五行”、“五常”、“五德”	舒大刚 申圣超	221
——试论蜀学与诸学道统论之异同		
论董仲舒与道统	刘振维	238
“通三统”与理学道统论的扩充	秦际明	256
扬雄的道统思想及其在道统史上的地位	蔡方鹿	268
韩愈儒学道统论及其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		
传播影响意义	杨翰卿 杨 兵 郑 杏	282
借鉴、超越与局限：韩愈道统论的思想史再考察	马 俊	294
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	尹邦志	304
——以李翱《复性书》为例		
论宗密对儒道二教的批评与融摄	杨 东	316
范仲淹与儒家道统	毛丽娅	326
周敦颐对天道性命的下通与上复	李勇强	343
治道、儒学、心性	陈逢源	356
——朱熹道统论之渊源与脉络		

朱熹道统思想对宋理学新经典体系构建的决定性作用	杨 燕 390
朱子道统观念的形上演进	刘 刚 401
——以“吾道一以贯之”章经典诠释为中心	
寄圣君于方寸之间	刘 畅 413
——朱子道统思想形成的心路考索	
道统的重叙：论“十六字心传”中蕴含的外王思想	谢海金 429
朱熹与王船山“理气观”之比较	傅玲玲 442
——从二者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诠释而论	
陈平甫与张栻交流提出“道统”时间考	胡 杰 459
工夫论视阈中的理学道统	陆永胜 472
从宗藩入嗣看道统与政统之争	胡长海 483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向世陵 495
道统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	周勤勤 507
——以方以智哲学思想为维度	
王船山的道统观	冯 琳 519
颜元的道统观	刘丽斌 530
乾嘉汉学对儒家道统的重构	崔发展 544
——以阮元对李翱的批评为例	
孙中山、方东美与牟宗三的道统论	曾春海 563
蒙文通先生的道统思想	刘兴淑 580
牟宗三与朱熹道统论的异同	冯 欢 592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江求流 604
——以对余英时“道统—道学之辨”的检讨为中心	
刘述先“理一分殊”的开放学统观.....	潘志锋 618
再论儒的起源.....	[韩] 金圣基 631
探赜“君子”人格.....	彭彦华 649
综论儒家的“为己之学”(己学)及其圆教可能.....	麻尧宾 670
文子的治国思想.....	吴 勇 687
清华简(五)关于“味”之哲学探究.....	郭梨华 694
“焚书坑儒”中的学术史寓言.....	潘忠伟 711
——“瓜冬有实”解读	
“道统”之外、“邵子之前”.....	李 利 721
——刘牧《易》学管窥	
张栻传世六札考释.....	杨世文 731
张栻哲学心性问题的探析.....	马 耘 749
张栻的心主性情论.....	王俊彦 764
张栻察识与涵养关系辨析.....	蔡 浪 772
三教视阈下的郑思肖思想.....	申喜萍 790
朱之瑜的实学及其影响.....	陈福滨 802
浅论黄宗羲政治价值论的转型与重构.....	李长泰 818
“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怡然 828

朱子论“道统”与“道心”

——从道的文化体现至道的道德实践

[美] 成中英

朱子对心性哲学的心有深刻的理解与体验，见之于他的“中和新说”与“心统性情”的论述中，但朱子更有进者在其对“人心”能转化为“道心”的认识，人心是以气为质，顺其形体，必将陷入欲念，如能遵从内涵的理性，则能自觉地掌握中和，不偏不倚，实现中庸之道。并能周知万物，利益天下。本文探讨“人心”如何转化为“道心”的自主之心基于性理的充实与主宰活动。陈淳的解说简约而生动，但对心中之意之能择善恶则未能发挥或根本忽略，本文当补正之。

中国的“道”的概念有丰富内涵，有道德、道义、道路等意义，同时具有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价值学的内涵。作为一个文化所遵循的价值以及对历史社会发展进行指导的规范原则，道当然可以具有一种统序，在此意义上，道不仅涉及天道，也涉及为政之道，而道的表达方式通过诸多文本尤其是经典来显示其存在。具体而言，经典从政治上谈王道、仁政之道，从做人方面谈中道、正道规范人生，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所以在这种丰富内涵中谈统序，谈表现方式，谈内在意识，甚至谈具有终极理想性的一种价值要求，比如天人关系、内外关系、群己关系、情理关系都可以谈道。

在“道”之精神层面谈道的传承、传播、创新有终极意涵，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轴。轴心文明，其实就文明整体来说，一个文明能够成为轴心文明，是有一个“道”。它包含文化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含义。从这方面客观地讲，道统怎么形成的？

道的终极价值观，来自道的认识的智慧，体现为实践精神，称为道心。对道的认识，大家常常追溯到孟子。孟子说文王、周公到孔子有五百余年，道

统逐渐形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①。对道德统序的认识，不断汇聚成一些概念、一些典范、一些圣贤的人格以及实践行为，比如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对人民的贡献等具体的事迹。所以，道统是非常具体的，历史上的成就和文化上的结晶，实际上就形成一套价值概念的典范，这是孟子对时代的反映。孟子积极推动王道仁政，他认为自己私淑于孔子，有强烈的使命感，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②孟子不但有道统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道统的实践者，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③这是有深刻的文化使命感，来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就说明了道统不仅仅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文化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一个促进社会进步的实践行为。如此来说，道统的概念尤为重要。

道统分成狭义和广义。简约地说，广义的道统，是基于对古代经典的了解，对宇宙天地自然的探索。首先要认识易道，易道之下有天道和人道。天道，是对宇宙创造力的认识，产生了一种“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信念。阴阳，作为对道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动的认识而成为道统的基本概念。人道，基于对天道的认识进而对个人的要求。孔子说，人道是人可以“成己成人”的道德修养，显示出德性，包含仁义礼智信等基本德目。就是说，在整体社会里面，人道包含仁政王道。一个人不仅应追求个人修身养性，进而修己安人，更要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之治，这就产生了仁政王道思想。天道实现于人道，而人道又实现于个人修养之道乃至王道。由此可以看出道统有它的真实内涵。道统不止有丰富的真实内涵，也有一套经典文本载体。道统，所具有的内在的一些概念内涵，实际上显示在《五经》里面。道统因为有了经典文本支持它，很好地统帅了以后的发展。《易经》是天道的文本。《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属于天道。王道的经典比如《尚书》以及后来的《春秋》，都为道统在政治领域的实践提供了说明，而周公旦的礼乐制度是通过实际的“三礼”来实现。人道中修身之道、修己之道，则集中表现在孔子的《论语》里面，当然还有《尚书》、《诗经》、《礼记》等经典，具体的还包括古代的六经、六艺。

① 《孟子·公孙丑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孟子·公孙丑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③ 《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我还要指出狭义的道统概念。从孔子到汉代逐渐形成的经学传统即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说明道统。不过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统逐渐收缩到儒家的经学传统。我做一个基本判断，由于经学的传统比较拘束、狭隘地限制在文本上面，道统仅存在于注释之中，对整个文化的丰富内涵的发展不一定非常有益，使其自身而走向形式化、被动化，消失了一种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广义的道统，不一定非要排除诸子百家如道家的思想精华。以《道德经》为例，《道德经》对人们认识宇宙天地、生命自然是有帮助的，对人生是有帮助的。同样，《庄子》提出“道术将为天下裂”^①，这种对道的统一性的认识也是对道统诠释的一种基本概念。

由于道可以包含万物，道统更容易吸取新的事物、新的文化。中国文化发展是逐渐吸收、发展、整合而成的。在今天我们可以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方面，不需要持狭隘的保守立场排斥对外来文化精华的吸收。我们的道统可以生长发展，不需要在新事物面前放弃道统，那样道统会丧失本原的概念，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对我们区分道统这两个狭义、广义概念有着深刻的立意。

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们没有道统，实际上是从宋明之后，道统没有好好继承下去，已经变成了理学、心学，把道统只看成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以致到清代成为很僵化的思想。康有为虽然有重建公羊学的新思考，但他偏离道统，只是一种改革方案而已。今天儒学的发展要回归广义而具体的道统传统。所以，经学不等于道统，道统也不仅是经学。

现在我们对道统的概念比较模糊，那么怎么才能产生新的道统？怎么激活道统？这形成了一个对道统的新思考。道统的基本概念的形成需要一个哲学体系，需要经典文本，需要制度如教育传承制度、讲学制度，来继承发展。北宋张载说“为往圣继绝学”。这个“绝学”是否指道统，表明在北宋时道统已经失落了呢？道统需要不断肯定、重建、参与。我认为，道统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维护者和重建者，就是先秦儒家的孔子和宋明新儒家的代表朱子。他们维护一些经典的文本，并且对开发道统的概念进行一种注释整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继承过去，一方面综合过去。孔子是继承往圣，凝聚成《五经》；朱子是继承北宋五子，放眼于古代经典。宋代开国的思想就

^① 《庄子·天下篇》，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

是回到《春秋》，回到易学，这样具有涵盖的一种意识，达到一个更开阔的境界也并非不可能。总而言之，道统的认识、重组重建和维护，孔子和朱子提供了典范。

孔子的一个伟大的地方就是把《五经》的精华融合成为一套人的生命与道德哲学，把道统变成人的终极理想和追求、对人的群己之道的追求，具有一种道统重建的性质，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文明圣贤的智慧。在《论语》中，孔子在《尚书》的引用方面，涉及夏商西周三代，甚至于尧舜的治理思想，对周公礼乐制度的强调，重新诠释礼的概念，他直接引用《诗经》里面的“天命”的概念。基于《尚书》对尧舜禹政治治理的记载和认识，孔子在人们的理想价值上面发展出仁道思想。在易学方面，孔子五十岁后非常重视道德价值观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基础，也就是易学的基础，所以他坐卧行都不离《易经》，以至于“韦编三绝”。从出土资料上看，《易之义》、《要》篇等，都追求占卜实现人的道德完满性的基础，发展人的善性。所以，从孔子对典籍的引用来看，不管《诗》、《书》、《易》、《礼》，孔子都在综合继承上形成了创新，创造出一套生命价值体系，包含了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宇宙哲学、政治哲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哲学体系，这是道统的根源。

孟子继承孔子，把人的善性基本发挥出来，使我们能够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这是一种对人性的基本肯定，是道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孟子继承孔子，提到《尚书》中的 16 字箴言，构成道统精神的认识。这些思想，虽然孔子作为教育家把它逐渐形成固定文本，为道统提供了一个文本基础、传承基础，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工具，但在精神内涵方面还需要去发挥。这就形成了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和孟子的《孟子》。从《四书》对道统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五经》的传承凝聚到孟子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一脉传承。孟子强调人之为善源于内在，而道统中最重要一点就是人性与天地联系在一块。天地为善，形成万物，万物生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①。这样一种精神是道统内涵的最重要部分。从人这方面来说，孟子的性善论是对天的认识，是对人的自我实现、创造一个美好的精神文明社会的认识。《中庸》特别强调《尚书·禹贡》的十六字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道统精神做更具体的说明。在继承天道的过程中，

^① 《周易·乾卦·彖传》，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 页。

人作为一个载体，在气质上如何去实现道的精神呢？这就提出了道统的一个中心思想，即作为一个人怎样实践道。“允执厥中”的概念，也就是对天地“中道”的认识，要发挥天地创造之道而不走向偏离，以创造为主，才不会走向毁灭，能够对应万物求其和谐，“和能生物”，因而产生新的事物来传承发展，成为生生不已之道。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可能在国学传播中慢慢消除，其实也是社会的变化、历史的变化，导致佛学统治中国数百年。道的思想是否消失了呢？显然没有。韩愈写《原道》，说道统需要继承下去。他指出孟子后没有传人，并不是说儒学道统已经消失，而是缺乏了综合的发展和传承，现在是否应该重新恢复道统，重新认识整合道的思想呢？

到了宋代，宋儒们回答了韩愈的问题，说其实孟子之后还是有圣人的，比如董仲舒、扬雄、王充等，但都是个别思想的开发者，不是整体的道统思想。董仲舒基于《公羊传》走向“阴阳五行”说；扬雄基于易学的玄通写成《法言》，但是对儒学义理没有太大发挥；王充也有局限性；韩愈提出道统有功，他以仁为博爱，开拓了一些新思想，恢复了道统的一些气息，但还未建立道统。回到广义的道统可能要到朱子，因为从思想作为上来说，朱子对呈现道统具有重大意义。

朱子继承北宋诸子，整合思想，同时对《四书》和其他经典加以注释，这些注释就是对宋代理学的整合，包含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思想框架和其他学术建立沟通关系，所以从这些来看，朱子有恢复道统的意识，而他也自觉谈到道统的思想，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里面，提出道统来自道心，这就继承了孟子的认识，确立了一个新的道统关系。其实同时代的陆象山也有道统概念，陆象山以继承孟子自居。宋儒们能够掌握天地学问来发扬光大“道”的精神，孟子之后没有他人如此重视道统。在道统传承构建方面，宋明学者的确做了很大努力。

这样的道统思想，到了近代、当代，有了新说法。很多学者对中国文化进行概括。对中国文化精神概括得越好，就越能掌握道统的内涵。广义上说，熊十力认为《五经》之后，先验哲学的发展，推崇《易传》，以陆王作为基础，疏远程朱。但其实如我们之前所说，道统不只是哲学思想，也是文化遗产。实际上，朱子在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努力要超过陆王。还有些人认为没有道统，孔孟之后没有道统。方东美似乎也有这样的说法。俄国人马林曾问孙中山，你的革命精神基础是什么？孙中山说，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德上面，这

是中华民族之立国之本、价值之源。我认为有基本的道理，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动力是什么？一定有价值动力源，一定有天道、人道的思想。实现政治理想本身就应该属于天道，属于人道。实现政治理想必须要有文化哲学的基础。这个文化哲学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道统，实现于他的三民主义。

道统不可以没有哲学作为基础，不可以没有经典文本作为载体，不可以没有典型的人格，不可以没有制度传承，不可以没有广泛的实践，更不可以没有道德心灵的确认、自觉与实践。从这几个标准来看，从《五经》到《四书》到新国学的继承与发展，道统有它的时间性和阶段性，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够掌握它，并把它看成传统继承和未来发展目标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认识道统。所以，我们要掌握道统的基本思想并且能够加以实行。

朱子曾讨论“人心”与“道心”的差别，并涉及了“人心”如何能实现“道心”这一命题。通过围绕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可以凸显朱子心性之学的特点与得失。

首先有必要回溯朱子对“心”的认识以展开讨论。朱子对“心”的认识，有其包含性与深刻性。他既整合了两宋理学家对“心”的认识，又重新系统而深刻地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所涉及的“心”之概念的含义。2012年，我曾撰文论述中国古典儒学中“心”的概念，指出：《中庸》着重探讨了“性”的问题，集中于“性”之义理的发论，辨析“性”的功用，但罕有对“心”的说明，至少没有明显地论述“心”；《大学》探讨了“心”之主导性与人之由内而外的转化，但对“性”的论述则较少。在《孟子》处，既谈了“心”，也谈了“性”，且此二者在孟子看来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有道德感情，发而为四端，四端皆可谓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这里的四端之“心”，均直接指向一种“心”的活动，并又能用来说明人的“性”之为善。因此，在早期儒家学说中，有着这样一种古典的论述：“心”是“性”的表达。

到了宋代，胡宏对这种古典的论述有了新的表达，认为“性”是体，“心”是用。不过，朱子对此又有另样的认识。朱子的看法，既结合了张载、二程的学术传统，又体现了人的直觉经验，故而有了新的认识，以此超越了湖湘学派。他的看法，至少应该被认为包含了以下两点：一、“心”就是知觉，人所

谓有“心”，也就是有知觉能力，张载和二程也均作了类似的肯定^①；二、“心”是一种主宰，它“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②，此说大抵在他近四十岁时与张栻论学后才整合得出，是他处理“心统性情”之提法的重要认识前提。对于“心”作为主宰这一思想的根源，吾人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以至于荀子。在《解蔽》篇中荀子明白地提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这里强调了“心”自主活动的能力，即属于彰显“心”之主宰性的说法。所谓“心”能作为主宰，一方面表明其有自我控制、自我确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指心能影响与转化与依存的性情，即朱子从张载的“心主性情”发展为“心统性情”之说。

至此，吾人应该分析“心”与“性”的关系。首先，“性”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特质与潜能。古典儒家很早就重视“性”这一概念，孔子既强调“性相近，习相远”，又说“人之生也直”，这里的“生”与“性”是相互联系的，“生”的表现就是“性”的表现。生而有性，性而能生。孔子并言“人之生也直”，以“直”训“生”，一方面能表“直接”义，也就是说，“自然之生是一种直接而真实的表现，其并非是在曲折地表达某些不可知的东西，而是在直接地显明其特质；另一方面，“直”又可能带有道德含义，也可被训为“正直”。事实上，“直”是“德（惠）”字的一部分，本身可能就具有好、善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实际上是肯定了人本是趋向于善的，并以趋向于善为善。从宇宙论的角度看，人之生命的出现，更可以被视为是“善”的意义之所在。也就是说，“生”就是“善”的，生生不已的发挥、发展也是“善”的，“善”亦自与“生”相关联。因此，《易传》乃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能继承生命的本源，并将其发挥下来，持续地发展其内在的能力、表达其内具的德性，这就是“性”，而从其根源上讲，这又是“善”。这就是古典儒家从孔子到《易传》对“性”所具有的深刻体验。

当然“性”也可以说是内在于生的潜在状态，以生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当其未发之时，还处在一种内在的状态。“性”的内在性（诚）和它的外在

① 而佛学中的“五蕴”也是在说明“心”的知觉或感觉之能力。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2页。